

数字化社会再生产、知识资本有机构成变化与“双循环”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黄建忠 黄丽华

摘要：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对数字经济背景下社会再生产、资本有机构成和“双循环”内在关系进行创新研究。文章突破了传统资本有机构成理论对价值量的单一关注，通过考察数字经济下知识密集型、创新驱动型等新型不变资本的创新形态及其作用，解释了数字化社会再生产、知识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及其对国内、国际“双循环”产生的影响，并对数字经济驱动的国际化社会再生产循环关系进行国际经济学理论拓展分析。在总结回顾经济史四类典型案例及其理论、实践启示意义的基础上，本文对提升我国创新驱动型资本有机构成、加快发展数字化社会再生产以及构建高质量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数字经济；社会化再生产；资本有机构成；“双循环”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670(2026)02-0001-21

引言

2020 年 5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首次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意义不仅体现在国内需求的扩大和供给侧改革的深化，还深刻影响到国家的技术创新、产业布局、资本流动、劳动力配置等各个方面。特别是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极大推动了社会生产方式、产业结构、价值链的重构。数字经济通过改变资本的有机构成，推动了知识资本、技术资本和创新资本等新型资本的形成和积累，成为“双循环”战略的重要驱动力之一。

进入 21 世纪以来，全球经济逐渐向信息化、数字化转型，数字化社会再生产成为现实趋势。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日益成熟，数字经济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EF)的定

[收稿日期] 2025-11-1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构建面向全球的高质量自贸区网络研究”(ZDA062)

[作者信息] 黄建忠：福州外语外贸学院特聘研究员，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黄丽华(通讯作者)：福州外语外贸学院教授，电子信箱 huanglihua@fzfu.edu.cn

义,数字经济包括互联网及其他信息通信技术所衍生的各类经济活动,包括在线商务、数字支付、智能制造、数字化服务等领域。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根据国新办2026年1月21日发布的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达到49万亿元,占GDP的比重约为35%。数字经济兴起,使资本的有机构成发生了深刻变化,尤其是知识资本和技术资本的比重急剧上升。传统产业依赖于大规模的物质资本和劳动,而在数字化社会再生产时代,越来越多的生产活动依赖于信息流、数据流和知识流,资本的有机构成因此呈现出知识密集型、创新驱动型的特点。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看,资本有机构成(Capital Organic Composition)变化是社会生产方式变革的核心,是新质生产力和新型生产关系演化的基础。从全球化的实质分析,大国之间经济循环关系的失衡与再平衡过程是导致全球化变局的根本原因。因此,以知识密集型、创新驱动型资本有机构成为基础,高质量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既是大国竞争的关键,也是重塑全球化新格局的主要驱动力。探讨数字经济背景下的资本有机构成变化,对于理解和推进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至关重要。

一、文献综述与理论拓展方向

(一)数字经济与资本有机构成的理论研究

资本有机构成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它深刻和科学地描述了可变资本(劳动力)与不变资本(生产资料)之间的比例关系。数字经济的崛起不仅对产业结构产生深刻影响,也对传统的资本有机构成理论提出了挑战。随着数字经济的兴起,劳动力和不变资本的构成发生了显著变化,知识资本、技术资本等新的资本形态日益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导力量。

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是推动资本有机构成变化的核心因素。林毅夫(2012)^[1]在《新结构经济学》一书中提出,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尤其是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社会生产方式正在被重塑。在数字经济中,劳动力的比例逐步下降,而知识资本和技术资本的比重迅速上升,改变了资本积累的方式,从而使得资本有机构成发生了质的变化。张军(2017)^[2]在其“过渡经济”理论中指出,我国作为过渡经济体,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不仅受到技术进步的影响,还受到政策、制度和市场环境的深刻作用。在我国特有的制度背景下,改革开放与市场化进程的推动,使得资本有机构成呈现出渐进式变化的特点。因此,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化进程不仅加速了生产力的提升,也通过技术创新推动了社会生产关系的转型。

数字经济的兴起加速了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姚梦真和姚远(2020)^[3]指出,数字经济通过信息流、数据流和资本流的高效传输,不仅改变了生产方式,也推动了全球价值链的重新布局。数字经济通过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加速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构,使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发生了深刻变化。王俊和苏立君(2022)^[4]强调,数字经济是推动社会再生产方式转型的关键因素。随着生产过程中技术资本比重的上升,劳动力作用逐渐减弱,社会再生产的重点从传统劳动力集

中的物质生产转向更加注重知识、信息和数据的生产。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分配关系、消费结构和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徐志向等(2021)^[5]认为,在信息产业和高科技产业中,知识资本与技术资本的比重日益增大。他们指出,数字技术使得传统资本(如工业生产资料)逐渐被智能化、数字化的技术所替代,加速了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推动了新的社会再生产方式的变革。

(二) 社会再生产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互动关系研究

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强调,社会再生产不仅是生产过程的延续,更是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的有机统一,社会再生产的方式和结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与社会再生产方式变化存在双向互动关系。冯金华和孟捷(2019)^[6]认为,实施“双循环”战略使我国经济更加注重内需的拉动作用,推动了国内市场扩张。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为国内市场提供了更加丰富的产品和服务,同时也促进了国际市场需求的多元化,这种双向互动过程推动了社会再生产的深刻变革。赵峰等(2017)^[7]提出,数字经济不仅改变了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配置,也推动了全球贸易、投资流动和产业链重构。在全球化背景下,数字经济为我国提供了独特的发展机会,尤其是在全球价值链中,通过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我国能够在“双循环”格局中获得更多的国际竞争力。

(三) 全球化、逆全球化背景下的“双循环”与数字经济研究

全球化与“双循环”之间的关系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双循环”战略不仅强调国内市场的重要性,也强调通过国际经济合作推动全球资源配置优化。王跃生(2023)^[8]认为,全球化背景下的“双循环”不仅是经济内外互动,更是一种全球协同模式。刘元春(2020)^[9]认为,全球化正在从传统的贸易和投资流动,向数字化、网络化的“数字全球化”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数字经济通过降低信息传播和交易成本,提高了全球市场的互联互通性,推动了国际市场的整合。对于中国而言,利用数字技术打破地理与时间的限制,不仅能够促进国内大循环的高效运作,还能增强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话语权和竞争力。因此,数字经济与“双循环”的深度融合,不仅促进了国内经济循环的良性发展,也为中国在全球经济中赢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创造了条件。黄建忠等(2024)^[10]提出,全球化背景下数字技术的普及应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数字经济成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核心动力之一。数字技术不仅提升了中国制造业竞争力,同时也为中国跨国公司提供了更多的合作机会,推动了全球产业链的深度融合。

杨连星和铁瑛(2023)^[11]强调,逆全球化本质上破坏了大国之间的经济“双循环”平衡联系。数字经济兴起为国际贸易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通过平台经济、电子商务和跨境电商等方式,全球生产与消费的界限逐渐模糊,推动了全球市场的统一。因而,数字经济是对冲平抑逆全球化的一种力量。

(四) 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双循环”战略研究

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双循环”战略的外部支撑之一,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区域一体化可以通过削减贸易壁垒、优化资源配置,进一步推动我国在国际经

济中的深度参与。黄建忠等(2023)^[12]提出,区域一体化和区域自由贸易协议是实现“双循环”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促进区域内的产业合作、资本流动和技术共享,增强了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性和韧性。尤其是亚洲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为中国的“双循环”战略提供了一个更加开放的市场环境,并推动了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经济协同发展。

数字经济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铁瑛等(2022)^[13]指出,随着RCEP的实施,区域内国家通过数字经济平台实现产业互补,推动跨境电商、物流、金融等领域的深度合作,这些合作不仅促进了中国与区域内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也增强了区域经济的全球竞争力。数字技术的普及不仅为中国提供了更大规模的出口市场,也使得区域内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流动更加高效。此外,许唯聪和杨婷(2023)^[14]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推进对于我国实施“双循环”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高新技术产业和数字经济领域。随着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入发展,我国可以借助区域一体化的框架,推动更高质量的产业升级,并通过跨境资本流动、技术流动和贸易流动,进一步强化国内经济循环。

(五) 利用外资、对外贸易与“双循环”战略的关系研究

在“双循环”战略实施中,外资与外贸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刘鑫和顾雪芹(2022)^[15]进一步指出,外资流入的质量与结构对于“双循环”战略的实施至关重要。利用外资应当更多地引入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的项目,尤其是数字技术、人工智能、5G通信等领域的投资,以提升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与此同时,外资还能通过推动国内市场的开放与竞争,促进国内市场化改革。戴翔和华笑烨(2024)^[16]提出,外资在“双循环”战略中具有双重作用,不仅可以引入外部技术和资金,促进国内产业升级,还能通过加强与外部市场的联系,推动我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地位的提升。数字经济的兴起使得外资引入方式发生了改变,特别是在信息技术、互联网金融等领域的投资,不仅推动了国内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提升了我国在全球创新体系中的话语权。在对外贸易方面,顾晓燕等(2023)^[17]认为,对外贸易不仅是我国融入全球市场的重要途径,也是我国推进“双循环”战略的关键环节。通过推动高附加值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我国不仅能扩大国际市场份额,还能通过贸易合作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数字经济推动下的跨境电商和数字贸易,使得国内外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也增强了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杜运苏和张为付(2021)^[18]认为,对外贸易的创新将推动“双循环”战略的实施,特别是在数字经济领域,跨境电商以及数据和数字服务的自由流动,使我国能够更好地融入全球供应链,推动国内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六) 现有文献的局限性与本文的创新方向

尽管现有文献在“双循环”战略、数字经济与资本有机构成的相关领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仍存在明显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契机,并进一步凸显了本研究的重要性。具体来说,现有文献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缺乏对“双循环”微观层面和资本有机构成变化机制的深入探讨

目前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双循环”战略的宏观层面,探讨的是国家层面的经济政策调整、全球化趋势中的中国经济战略定位,以及外部经济环境对“双循环”实施的影响。然而,这些研究对“双循环”格局中具体经济主体行为的深度分析较为薄弱,尤其是通过数字经济和技术创新推动资本有机构成变化,进而影响社会再生产的具体机制尚未有深入讨论。尽管现有文献已经关注到数字经济对资本有机构成的影响,但关于数字经济如何改变劳动、资本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一变化如何促进“双循环”格局的形成,仍然缺乏系统的理论分析。因此,本文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的角度,探讨数字经济背景下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揭示其对“双循环”战略的深层次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2. 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理论的结合较为松散,未形成系统的理论框架

尽管已有研究深入探讨了社会再生产的变革和数字经济的作用,但对于社会再生产如何通过数字经济对传统经济的深刻改造重新构建“双循环”体系的系统性研究仍显不足。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下,数字经济如何推动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以及这一变化如何影响社会再生产机制,尚未有系统的理论建设。本文结合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分析数字经济如何在“双循环”格局下推动国内外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关系重构,从而影响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

3. 全球化视角下的“双循环”研究较为分散,也缺乏对国际循环和数字经济互动机制的全面分析

现有研究大多专注于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相对独立性,缺乏对二者如何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深入分析。大多数文献仅仅强调了国内市场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然而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在国际市场中实现资本、技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并借此推动大国之间经济“双循环”格局的深度融合,仍然是研究的盲点。在全球化背景下,数字经济不仅加快了国际贸易、跨境资本流动的速度,还推动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组,从而影响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本研究的核心贡献之一在于从全球视角出发,探索数字经济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作用,尤其是数字经济如何通过推动资本的国际流动与知识技术的全球传播,促进国内外经济的双向互动。

4. 缺乏系统的量纲分析,难以验证理论框架的现实可观测性

现有文献虽然提出了丰富的理论框架和政策建议,但缺乏系统直观的量纲界定来验证理论形态的现实可观测性。关于通过具体的经验案例,证明资本有机构成变化对社会再生产模式的影响的实证研究相对不足。

基于现有文献的局限性,本文的创新在于,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与数字经济背景下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相结合,提出新的理论框架,以解释数字经济如何通过推动资本结构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影响社会再生产的全局。首先,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的视角,结合数字经济对资本有机构成变化的影响,本文构建一个新的理论框架,为“双循环”战略的理论深化提供支持。其次,本研究拓展

了数字经济与资本有机构成变化之间的联系，揭示了通过数字化推动知识资本和技术资本的增值，进而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再次，本研究还通过经验分析，验证理论框架的现实适应性，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实证支持，使其在制定符合数字经济时代背景的“双循环”政策时，能够充分考虑数字技术对资本结构、产业转型和社会再生产方式的深刻影响。最后，本研究还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以增强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

二、社会再生产、知识资本有机构成变化理论及其拓展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揭示了社会生产过程、再生产过程的相互联系与统一性。马克思认为，社会再生产不仅仅是生产过程的延续，更是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的交织。推而论之，在全球经济背景下，它也是国内社会再生产与国际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统一。在这一过程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是推动社会再生产方式转变的关键。

数字经济正是在全球化深度发展与技术革命的交织下，催生出的新的社会再生产方式。传统的工业经济生产方式以大规模生产、标准化产品、劳动力与资本的简单结合为主，而数字经济的兴起则将生产过程由单一的物质生产转向更加复杂的知识生产和信息生产。在这一过程中，劳动力、生产资料、劳动对象，以及生产方式、交换关系、分配关系都经历了深刻的变化。数据成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人工智能等技术成为生产力的重要结合方式，传统的生产模式和产业结构正在被颠覆和重构。数字经济不仅加速了产业链和供应链重组，而且推动了全球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联系重构。特别是在我国提出“双循环”战略之后，国内经济循环强化和国际经济循环协同成为经济发展的双引擎。通过国内大循环，提升国内供给体系的效率；通过国际大循环，提升全球资源配置的优化能力。在这一背景下，数字经济所带来的知识资本有机构成的提升，正是推动“双循环”战略落实的重要力量。知识资本的增加意味着一国能够在全球产业链中提升附加值，推动产业升级。与此同时，国内市场的扩大与产业结构的优化，也能为全球市场提供更多高质量、高附加值的产品与服务，进而推动全球经济的协同发展。

（一）基础逻辑：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

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是其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基础，它阐释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循环的内在机制，尤其是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之间的有机联系。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再生产的分析，提出了资本有机构成、剩余价值的积累以及社会经济扩展的规律。随着数字经济的兴起，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仍然提供了理解资本积累和社会再生产方式变革的基础框架，但需要结合数字化转型、技术进步和知识资本等新要素的变化进行拓展。

本文在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框架下，结合相关公式和推论，分析在数字经济背景下，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如何推动社会再生产的转型，并探讨其对“双循环”战略实施的影响。

1. 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统一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社会再生产是生产过程与再生产过程的有机统一。社会生产并不是孤立的,它包括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相互联系的环节,这些环节共同构成了社会经济的整体循环。马克思指出,社会再生产必须实现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统一性。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生产过程,无论其社会形态如何,都必须是连续的,或周期地不绝地通过相同的各阶段”(卡尔·马克思,2009)^[19]。因此,生产过程是一个周期性的循环,它涉及生产资料的生产、商品的交换、剩余价值的实现以及消费的扩展。

首先,社会再生产是社会简单再生产与社会扩大再生产的统一。简单再生产是指生产的商品完全用于社会消费,不进行资本积累和生产规模的扩张。而扩大再生产则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被再投资到生产中,推动生产规模的扩大。这一过程是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结果,它为社会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持续的动力。在资本主义社会,扩大再生产是资本增值的关键机制,它推动了社会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

其次,社会再生产是价值创造与价值增值的统一。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但创造的价值不仅是商品的交换价值,还包括通过剩余价值的方式进行增值。马克思指出,“劳动过程不过是价值增值的一个手段”。这意味着,通过劳动的投入,不仅是商品本身得以被生产出来,而且劳动的价值增值还推动了资本的积累和社会财富的增长。

最后,社会再生产是国内、国际再生产过程的统一。在全球经济视域下,结合马克思的对外贸易与世界市场理论,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框架蕴含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即在开放型经济背景下,一国社会再生产过程也必然是国内、国际再生产过程的相互统一。

2. 社会再生产的两大部类理论与资本有机构成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提出了社会再生产的二部类理论,即将社会生产分为生产资料部门和消费资料部门。这两大部类通过交换和生产资料的重新投入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循环和扩张(卡尔·马克思,2009)。

第一,关于生产资料部门与消费资料部门的分工关系。社会生产总量分为两大类:生产资料部门生产的是用于进一步生产的物品,如原材料、机器等;消费资料部门则生产供社会消费的商品,如食品、衣物等。两部门之间的互动通过交换完成,通过货币流通实现商品价值的转移,推动了整个社会再生产的运行。

第二,关于资本的有机构成及其变化。每个部类的资本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不变资本指的是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的资本,如机器、原材料等,而可变资本则是用于购买劳动力的资本。马克思认为,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尤其是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比例变化,直接影响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资本积累的速度。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通常意味着生产力的提高,但也可能导致劳动力的减少和资本对劳动依赖程度的下降。这一变化是资本主义经济持续发展的推动力,但它也加剧了劳资关系的紧张程度,尤其是随着自动化和数字化进程的推进。

3. 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公式分析

(1) 在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下, 社会生产的剩余价值全部用于消费, 生产规模没有扩展。马克思通过以下公式进行描述:

$$\text{部门 I (生产资料部门): } 4000c + 875v + 875m = 5750 \quad (1)$$

$$\text{部门 II (消费资料部门): } 1750c + 376v + 376m = 2502 \quad (2)$$

在这种情况下, 部门 I 的可变资本与剩余价值($v+m$)正好被部门 II 的资本 c 消耗完, 没有任何积累。这意味着, 生产活动只是维持原状, 社会经济并未实现规模扩张。

(2) 扩大再生产则通过剩余价值的再投资, 推动生产规模的扩大。公式如下:

$$\text{部门 I (生产资料部门): } 4000c + 1000v + 1000m = 6000 \quad (3)$$

$$\text{部门 II (消费资料部门): } 1750c + 376v + 376m = 2502 \quad (4)$$

在扩大再生产的情况下, 部门 I 的可变资本与剩余价值($v+m$)被重新投入并产生了 250 余额, 因此推动了生产资料部门的资本积累。通过式(3)、式(4)可以看到, 部门 I 的剩余价值投入到自身生产过程($1000v+1000m$)后, 推动了社会生产规模的扩大, 并为社会再生产提供了物质基础。

因此, 第一部类的剩余价值不仅是社会再生产的物质基础, 还为扩大再生产提供了动力。马克思认为, 第一部类的剩余价值, 尤其是其技术含量的提高, 是决定社会再生产规模和速率的关键因素。

(二) 理论拓展: 数字经济对资本有机构成和社会再生产的影响

数字经济崛起带来了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数字技术的普及使得知识资本和技术资本的比重大幅上升, 传统的劳动和物质资本逐渐被新的生产要素所取代。这一变化对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

其一, 数字经济推动了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数字经济推动了生产过程中的技术进步, 特别是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应用领域, 不变资本的比重迅速上升。例如, 传统的制造业和农业通过数字化转型, 减少了对劳动力的依赖, 转而依赖更加智能化、自动化的生产方式。

其二, 数字经济促进了社会再生产方式的转型。数字经济使得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关系变得更加灵活、智能化。例如, 跨境电商、平台经济等新兴模式, 打破了传统的生产与消费的界限, 使得生产和消费的联系更加紧密。知识资本的提升和生产消费的互联互通, 推动了全域经济的分工合作, 社会再生产的过程和效率得到改造重塑。

其三, 数字经济实现了国内、国际社会再生产的统一。数字经济具有天然的跨国、跨区域性质, 由于数据要素的革命性及其在全球范围内几乎零成本的规模经济外部性作用, 数字经济国际间的渗透性、传导性加快实现了国际化社会再生产的统一性。

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为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机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数字经济的背景下, 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和社会再生产模式的转型, 为传统的社会经济循环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挑战。数字经济通过提升技术资本和知识资

本的比重,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提升,并在全球化背景下促进了跨国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再生成模式发展。由此,我们通过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框架,结合数字经济对资本有机构成和生产方式的影响,揭示了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如何通过提升生产力和知识技术含量,推动社会再生产的持续发展。这为我国在数字经济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推动内外循环的良性互动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三、数字经济、知识资本有机构成与“双循环”的现实演绎

(一) 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及其现实演绎

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理论是理解现代经济运作的重要工具之一。通过可变资本(劳动力)与不变资本(生产资料)之间的比例关系,马克思揭示了生产过程中资本积累和剩余价值的实现。不变资本比例较高,意味着更多的资本用于购买生产资料,而较少的资本用于购买劳动力。这种结构意味着较少的劳动创造剩余价值,从而影响了利润率和资本积累的效率。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通过分析不同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进一步探讨了技术差异如何导致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并进而影响不同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差异(卡尔·马克思,2009)。马克思指出,资本的技术构成直接决定了其有机构成的比例,技术进步往往使得生产过程中不变资本的比例增加,这一变化直接影响剩余价值的生产。

一是技术不变基础上的资本有机构成与利润率差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写道:“如投资额相等,则利润率的不等,是由于在剩余价值率相等时,所推动的活劳动量不等”(卡尔·马克思,2009)。这就是说,在相同的资本投入条件下,单位不变资本推动的活劳动量(即劳动时间或劳动人数)越多,则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量或利润越大。在技术不变的情况下,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差异,会导致其剩余价值创造的差异。在资本有机构成较低的生产部门,劳动力的投入更为密集,因此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也更多。相反,在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生产部门,由于不变资本的比重增加,劳动力的投入量减少,剩余价值的生产效率下降,从而导致较低的利润率。

二是技术差异基础上的资本有机构成与利润率差异。在不同技术水平的生产部门中,资本的有机构成可能相同,但剩余价值的生产量却有所不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提到:“总资本在各不同部门虽以等量存在,但这诸等量却包含不等量的剩余价值的源泉,而剩余价值之唯一的源泉,便是活的劳动”(卡尔·马克思,2009)。这表明,尽管各个部门的资本投入相等,但不同技术水平的部门,其生产效率、剩余价值的创造效率是不同的。技术创新使得资本有机构成发生变化,并且在相同资本投入下,能够推动更多的剩余价值的创造。这种差异体现了技术差异对资本有机构成的影响,进而推动了利润率的变化。行业生产力越高,技术含量越高,其资本有机构成就越高,因此,尽管这些行业的利润率较低,但它们的资本积累速度和生产规模较大,从而能够在长期内获得较高的利润。

三是无论资本有机构成变或不变,资本家或企业主都会千方百计地延长劳动时

间,或加强劳动强度以实现尽可能高额的利润,从“活劳动”创造价值和“死劳动”转移价值中获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机器奴役劳动”是时常存在的现象。

(二)数字经济与资本有机构成变化

随着数字经济的崛起,技术进步不仅在传统产业中产生了显著影响,还推动了资本有机构成的根本性变化。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的应用,极大地提升了生产效率,并促进了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

智能化、自动化技术改变了资本有机构成。在数字经济时代,智能化和自动化技术的广泛应用导致生产过程中不变资本的比重显著增加,马克思所说的“活劳动量”与“不变资本量”之间的关系在数字经济中得到了再演绎。例如,在制造业中,传统的人工生产模式逐步被机器设备和智能化生产线所替代,这些智能生产设备减少了对劳动的依赖。因此,在这一过程中,不变资本的比例增加,而可变资本的比例则相对下降,即资本有机构成的比例发生了变化。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等技术的应用,使得生产企业能够以更低的劳动投入达到更高的生产效率,从而推动了不变资本的投入,并相应提升了生产的技术含量。这一转型在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也促进了利润率的变化,数字经济中的高技术部门往往会经历初期较高的利润率和数字技术扩散后较快走低的利润率,后续则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和规模效应,获得更大的资本积累和市场份额。

进而,数字经济推动生产效率提升与剩余价值增值。数字经济通过智能化、数字化的生产方式,使得各行业的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在传统生产模式下,劳动时间和劳动人数决定了剩余价值的生产量;而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技术资本的投入改变了生产过程的形式,使得单位不变资本所推动的“活劳动量”显著增加,而剩余价值的生产则更多依赖于技术的创新与数据流通。例如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算法和互联网平台的应用,使得传统行业通过数据处理和智能优化提高了生产效率,从而大幅降低了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推动了资本积累和剩余价值的增值。在这一过程中,不变资本的技术含量和知识密集型程度越高,其创造的剩余价值和利润也会越大。

因此,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当其他情形不变,不同生产部门所使用的资本在周期时间或资本有机构成的价值比例上有差别时,那种同时并存的生产部门之利润率,也会有差别”(卡尔·马克思,2009)。这一点在数字经济中得到了更加鲜明的体现。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理论为我们理解现代商品经济运行中的利润率变化和资本积累提供了重要视角。数字经济的崛起不仅推动了技术进步和生产力提升,还加速了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在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的推动下,不变资本的比重显著上升,生产过程中对劳动力的依赖减少,而生产效率的提升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则带来了剩余价值的增值和资本积累的加速。通过对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理论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技术创新不仅是资本有机构成变化的推动力,还通过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增加剩余价值的方式,促成了利润率的差异。在数字经济背景下,这种变化更加显著,并对各行业的生产方式、利润率及资本积累产生了深远影

响。因此,理解资本有机构成变化及其对利润率的影响,对于把握数字经济时代的经济发展趋势、推动“双循环”战略实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四、开放经济下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国际经济学拓展

(一)再生产过程的国际化

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视为社会经济的四个基本环节,强调这些环节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内在联系和循环性。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再生产过程的国际化使得这一理论的应用场景得以拓展。随着全球化和数字经济的兴起,国际市场和生产要素流动成为全球经济运作的核心。在开放经济背景下,国内社会再生产过程不仅要依赖于国内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互相转化,还涉及跨国资本流动、技术传播以及劳动力的全球流动。由此,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再生产不仅仅是国家内部的经济循环,还是由多个国家(地区)的经济活动、生产方式、资本积累等多重因素构成的全球经济网络。

在这一背景下,对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需要从国内社会再生产到国际社会再生产的过渡进行新的解读。随着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逐渐国际化。全球化使生产方式演变不再仅限于一国经济内部,而是成为全球多国协同合作与竞争的产物,推动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重构。由此可见,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再生产是国内、国际社会再生产的辩证统一。

(二)国际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资本有机构成变化不仅局限于单个国家的生产体系,它还受到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不同国家和不同发展阶段之间资本有机构成的差异。不同国家由于技术水平、劳动力成本、资本积累等方面的差异,其资本有机构成存在显著的差别。在开放经济的背景下,资本的跨国流动、生产方式的技术差异以及全球生产网络的复杂性,使不同国家的资本有机构成在国际市场上产生了差异化影响。

1. 不同国家资本有机构成形成落差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生产体系存在显著差异。发达国家通常拥有高技术产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不变资本的比例较高,而发展中国家则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可变资本比例较高。高技术产业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通常较高。因为其生产过程高度依赖于技术资本和设备投资,而劳动的投入相对较少。相反,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资本有机构成较低,因为这些产业依赖于大量劳动力投入而非技术投资。

2. 资本有机构成的国际竞争与合作

国际资本有机构成的差异直接影响到不同国家(地区)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国家能够通过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提升生产效率,增强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而资本有机构成较低的国家往往通过低成本劳动力优势保持竞争力,但这种优势随着全球技术进步和资本流动的加速而逐渐减弱。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国家间的资本有机构成差异促进了全球经济格局的变

化,尤其是在数字经济时代,技术、信息和资本的流动更加高效,推动了全球经济的深度融合。

3. 数字经济与全球产业链重构

数字经济通过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应用,正在推动全球产业链的重构。数字经济通过智能化、自动化和网络化的生产方式,提升了生产的灵活性、响应速度和资源配置的效率。传统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链条通过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变得更加高效。例如,跨境电商、数字支付、供应链管理系统等技术的普及,改变了全球市场上商品流通的方式,并促进了生产环节的全球化布局。数字化使得全球产业链中的各个环节可以更快、更高效地协调,从而促进了全球价值链和生产方式的重构。因此,数字经济不仅提升了生产效率,还加速了全球生产要素的流动,从而改变了传统的全球价值链结构。全球产业链的重构,不仅仅是产品的生产过程发生了变化,更重要的是生产和价值创造的方式也在全球范围内发生了深刻变革。数字技术推动了全球产业链的重构,尤其是在数据流、信息流和技术流的高效传输下,全球市场的互联互通性大大增强。

4. 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角色

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过程中,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通过数字经济提升了自身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中国不仅是全球制造业的重要中心,还在互联网产品服务、电子商务、数字支付等领域处于领先地位。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中国不仅推动了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还创造了新的产业和市场机会。特别是在数字经济的驱动下,中国通过创新和开放市场,提高了资本有机构成,并加强了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

(三)简单的“循环”模型与拓展

1. 要素流动型阶段的模型与推论

在要素流动型阶段,全球经济的一个特点是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不均衡。资本的流动通常大于劳动力的流动,这一差异引致资本在不同国家间的不均衡积累。在这一阶段,由于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发展中国家在资本与外汇“双缺口”驱动下大量引进外资推动出口创汇的结果,推动了国际间资本的偏向性流动。公式如下:

$$G=S/K \quad (5)$$

其中, G 是本期和上期之间实际的产量增加率, S 等于储蓄增加率与引进外资增加率之和, K 是国内资本存量的实际增加量与产量的实际增加量之比,即资本—产出比。

(1)“双缺口”驱动资本有偏积累。在“资本饥渴”和“外汇饥渴”的驱动下,资本流动偏向技术较为发达的部门。这种资本的非均衡积累加剧了部门经济的不平衡,导致发展中国家加剧“二元经济”矛盾。

(2)劳动力存量不变时,资本积累的偏向性影响。当劳动力存量保持不变时,增加的不变资本存量会导致可变资本周转率(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的上升,进而带来剩余价值和利润差异。

2. 要素效率改进阶段的模型与推论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要素效率改进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驱动力。在这一阶段,劳动力和资本的效率提升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罗默的内生增长模型提出,通过教育、培训和技术进步等方式,国家可以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来提升经济增长潜力。公式如下:

$$G = (S + Sl) / K \quad (6)$$

其中, G 是本期和上期之间实际的产量增加率, S 为储蓄(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和), Sl 是人力资本积累带来的储蓄增加率, K 是资本—产出比。该公式表明,在人力资本积累的推动下,国家经济的增长率会受到劳动力效率提升的影响,而这种效率提升通常伴随着资本的更多投资与技术改进。

(1) 劳动力的倍加效应。人力资本的积累通常表现为劳动量的倍增,不仅增加了劳动力的绝对数量,还提升了劳动的整体生产效率。

(2) 资本积累与劳动力效率的协同效应。在不变资本存量不变的情况下,增加的可变资本存量提高了不变资本的周转率,进一步提升了全球生产效率。

3. 制度型开放阶段的模型与推论

在制度型开放阶段,全球化竞争和合作推动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无偏积累,即资本和劳动力的增长不仅在量上得到提升,也在质的层面得到优化。在这一阶段,国际经济关系趋向于更加均衡和协调,全球经济中的产能流动逐渐均衡,市场逐步高位出清。

(1) 长期的均衡经济关系。通过制度型开放,全球市场中的资源配置、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趋于平衡,全球产能的流动逐渐优化,市场的高位出清效率不断提高。

(2) 制度型开放推动经济合作。通过制度型开放,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进一步加强,技术共享和市场开放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协调发展。

4. 理论拓展与结论

拓展与结论 1: 单一要素的偏向性积累会导致国际经贸关系的失衡,在“双缺口”驱动下,资本的积累往往集中在资本流动性较强的部门,而劳动力流动性较弱的部门则面临投资不足的问题。

拓展与结论 2: 区域一体化和全球化合作是形成国际间均衡经济关系的关键,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国家间的经济关系更加紧密,促进全球经济的均衡协调发展。

拓展与结论 3: 数字科技驱动的新产业革命对全球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特别是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创新应有利于全球化产能流动的均衡布局。

拓展与结论 4: 数字科技的发展与全球经济增长的悖论形成了对制度型开放和国际间协调机制的需求,只有通过制度改革和国际间协调,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经济的不平衡和不均衡问题。

综上所述,数字经济和全球化深刻影响了全球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过

程,并推动了国际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尤其是在制度型开放的背景下,全球经济的资本和劳动积累方式呈现均衡化趋势,推动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构与优化。

(四)复杂的“双循环”模型与演化

1. 单一循环与平行循环

在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中,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过程是紧密相连、循环不断的。然而,不同经济体的发展阶段及其资本有机构成的不同,使得这些环节的相互关系和经济循环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在分析“双循环”战略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单一循环和平行循环的概念,探讨资本有机构成的演变及其对经济循环模式的影响。

单一循环模式通常指的是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内,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按固定的步骤依次进行。在这一模型下,资本有机构成保持不变,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比例在经济扩展过程中并未发生显著变化。单一循环的经济模式较为静态,通常出现在经济发展初期或资本积累较为缓慢的阶段。具体来说,在单一循环中,资本的投入主要集中在原材料和劳动力的生产上,生产和消费的关系较为简单。这种模式下,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非常缓慢,且资本积累基本依赖于生产的简单延续,而没有显著的技术创新或产业结构变化。公式如下:

$$G=S/K \quad (7)$$

其中, G 代表实际增长率, S 是储蓄与总收入的比率, K 为资本存量的实际增加量与产量的实际增加量的比值,即资本—产出比。在单一循环模型下,由于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经济增长率通常较低,资本和产出的增幅保持稳定。

在平行循环中,经济体仍然以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模式运行,但这一过程在不同部门之间呈现平行竞争的形式。与单一循环不同,平行循环下的经济体在资本有机构成上呈缓变状态,即不同行业或部门之间的资本投入比重发生了一定变化。通常,一些部门的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较快,而其他部门则保持相对稳定的增长。平行循环模式通常出现在经济发展的中期阶段,尤其是当国家(地区)逐渐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时。尽管经济内的资本积累在不同部门间有所差异,但整体上资本有机构成变化较为缓慢,经济增长仍然主要依赖于扩张生产规模和增加劳动力投入。公式如下:

$$G=(S \times M)/K \quad (8)$$

其中, M 为不同部门间资本积累的加权比重。在平行循环模式下,虽然资本有机构成发生变化,但由于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投入的结构变化相对缓慢,经济增长仍然依赖于传统的生产方式。这一模式强调了产业之间的竞争和不同资本投入的平衡,通常伴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逐步提升。

2. 交叉循环与融合循环

在分析“双循环”战略时,交叉循环与融合循环的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动态的视角,尤其是在开放经济的背景下,资本流动、技术创新和制度改革相互交织,推动着全球经济的互动和协同发展。

交叉循环是指在国际经济中,不同经济体之间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环节通过要素流动型相互作用形成的循环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不同国家(地区)的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跨境流动,推动了全球经济的互动。交叉循环强调全球生产过程中的资源和生产要素的流动性,特别是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如何影响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在交叉循环中,资本有机构成变化的速率较为渐进,尤其是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之间的比例逐步调整的过程中,不同国家的经济表现出产能过剩或产能不足的现象。具体来说,由于资本和劳动力在国际间的单向性流动,有些国家可能面临产能过剩的局面,而另一些国家则可能由于资本流动不足而面临产能不足的压力。公式如下:

$$G = (S + \Delta X) / K \quad (9)$$

其中, ΔX 代表资本和技术流动带来的外部效应,表明资本流动对不同经济体生产力和资本有机构成的影响。在交叉循环中,资本流动和技术传播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推动了不同国家经济的差异化发展。现实中,资本流动呈现不均衡状态,由于资本流动主要集中在资本密集型国家或技术创新中心,其他地区的资本积累和生产力提升相对滞后,导致全球经济出现非均衡的产能分配和生产率差异。

融合循环是在全球化背景下,通过制度型开放和全球化合作,促进资本、技术、劳动力等要素的无偏积累,形成更高效、均衡的全球经济循环。在融合循环中,全球资本的流动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实现了全球经济的高度融合和互利共赢。这使得全球经济不仅通过量的积累达到均衡,更通过质的提升(如技术创新、生产效率提升)实现了更加高效的资源配置。融合循环的关键特征在于,全球市场的制度型开放促使各国的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达到均衡配置,同时推动了资本有机构成的迅速变革,特别是在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中,不同国家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改革,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取得了更为和谐的地位。

在融合循环中,制度型开放不仅使得资本和劳动力的积累更加均衡,还通过技术创新和市场化改革提高了全球产业链的效率。在融合循环条件下,资本与劳动能够实现均衡积累。通过全球市场的开放,资本和劳动力不仅在数量上增加,更在质量上得到了提升。技术创新和劳动力效率提升为全球经济的高效运作提供了支持。

3. “双循环”的动态演化模型

“双循环”战略是中国在新时代背景下对全球经济新形势的积极应对。通过内需拉动与外需拓展并行的策略,中国推动国内经济循环与国际经济循环的深度融合,以应对全球经济变局。数字经济的崛起,为“双循环”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方向。技术创新和要素效率的提升将成为推动经济体系重构的核心力量。

(1) “双循环”的动态演化。“双循环”的动态演化模型反映了资本有机构成和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互动演变。通过不断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和生产要素的流动效率,全球经济的内外循环逐步形成了更加紧密的联系。数字经济不仅通过技术突破推动生产方式的转型,还通过信息技术和数字平台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协调发展。

(2)数字经济推动“双循环”升级。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通过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重构,为“双循环”战略提供了新的动能。数字技术推动了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加速了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通过加强国内市场的创新能力和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中国能够在全球经济中不断提升其核心竞争力。

4. 理论拓展与结论

拓展与结论 5: 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单一循环和平行循环的差异决定了资本有机构成的演变速率,单一循环下资本有机构成变化较慢,而平行循环则随着各部门的技术进步逐渐提升资本的有机构成。

拓展与结论 6: 交叉循环和融合循环的引入,体现了全球化竞争合作与技术传播的密切关系,交叉循环反映了资本和技术的流动,而融合循环则强调通过制度改革和政策创新优化全球生产要素的配置。

拓展与结论 7: 数字经济驱动下的“双循环”将通过技术创新和要素效率提升推动全球经济的深度融合,从而提升全球资本的有机构成,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优化升级。

拓展与结论 8: “双循环”战略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实施,将使中国通过制度型开放与技术创新提升其资本有机构成,进一步推动全球经济的高效运作与持续发展。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双循环”的复杂模型结合了内需与外需、技术创新与要素流动、国际合作与全球竞争,为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战略指导。

五、经济史经验的简单回顾与借鉴分析

对于本文研究主题及其所涉及理论和拓展分析的结论,经济史提供了丰富而典型的经验佐证。从商品经济演化发展的不同阶段看,从封闭经济到开放经济,从资本主义的一般商品经济到现代发达经济,从社会主义的早期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可以清晰地看到上述简单的“循环”模型和复杂的“双循环”模型实践变化的历史轨迹。

在封闭经济或自给自足经济状态下,社会再生产基本上属于简单再生产性质,社会生产力的落后表现为普遍的“低水平均衡收入陷阱”,不存在剩余价值,因而无从实现资本积累,社会经济处于封闭型的单纯国内循环即单一循环状态。

开放经济具有较为丰富多样的形态,总体上可粗略分为以下两类。(1)对于大多数低收入、中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国民经济发展普遍呈现为资本、外汇“双缺口”经济模式。因此,利用外资和出口导向(“出口创汇”)成为资本积累的基本手段或战略选择,不同经济部门和区域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平衡发展状态,即所谓“二元经济”形态,国民经济对于外循环存在巨大的依赖性。资本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变化具有阶段性、跳跃性与多变性。(2)对于中高收入、高收入的发达国家来说,国民经济发展的目标模式是利用外资与对外投资、出口贸易与进口贸易相对平衡,国内不同部门、不同区域经济水平也相对协调。在经济周期冲击影响之外,资

本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变化具有连续性与可持续性。综合以上两种粗略的分类形态,社会经济运行处于开放型的国内、国际循环即交叉循环状态。

从理论逻辑和历史经验出发,生产资料部门优先发展是工业化成功的核心命题。以早期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为例,正如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所提出的,工业化的基础必须依赖于重工业的积累和技术进步。苏联模式的实践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其失败导因不在于理论逻辑,而在于苏联在外部恶劣环境和“冷战”格局下选择了“平行市场”的错误实践路线。战后苏联和东欧所谓“卫星国”僵化的政治与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导致社会生产力的停滞不前,内外经济循环受阻造成资本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动力不足且最终“失速”。事实证明,国内、国际循环即交叉循环这一进程只有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依托世界市场的扩展,才能取得成功。全球市场的开放不仅促进了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还推动了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形成了全球产业链的高度互联和优化。这与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和二部类理论的内涵相契合,即社会再生产的推动力来源于生产资料部门的积累与技术进步。苏联模式的失败对于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而言,提供了深刻的历史启示。

在后起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美国汉密尔顿和德国李斯特的“幼稚产业保护论”提供了重要参考。这一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初期阶段应通过政策保护本国的幼稚产业,以便在全球市场中站稳脚跟,逐步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和实现技术积累与产业升级。这种路径并不与生产资料部门优先发展的战略相冲突,反而为后发国家提供了合理的工业化起步方式,强调了在全球化竞争中保护本国产业、促进本国资本积累的必要性。

战后日本的“重点生产方式”从一个事实经验侧面,印证了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与二部类理论的科学性。撇开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不论,战后日本在这一过程中重视生产资料部门的投资与技术积累,特别是在制造业和基础设施领域,这成为了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关键因素。这一经验表明,后起国家可以通过政府主导的政策扶持,推动资本有机构成的优化,达到产业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推而广之,本文提出的融合循环是经济全球化的理想形态,是有待于通过多边主义驱动全球治理不断完善而达成的目标状态。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全球化“失灵”可以理解为经济全球化面临的一轮挫折,尤其是大国之间“双循环”平衡体系的崩溃,也可以视作国际间资本有机构成变化、社会再生产形态演化中交叉循环向融合循环演进受到的暂时性阻滞。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它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缺失相匹配的新质全球治理体系的结果。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的研究为我国实施“双循环”战略提供了有益的理论 and 实践启示。总体而言,数字经济为更为知识密集型的资本有机构成和更高水平的社会再生产形态发展提供了新契机,也为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提出了平衡协调改革的努力方向。结合马

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和世界经济史经验,中国应通过深化改革和加大创新力度,继续推动生产资料部门的技术进步与创新,提升技术含量和产业附加值。特别是在装备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中,通过加强知识资本和技术创新的积累,提升资本有机构成,进而促进产业链的高端化与全球市场竞争力的提升。同时,加强制度型开放,吸引全球资本流入,推动国际合作,优化国内市场环境,将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推动“双循环”战略的顺利实施,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保持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一)主要结论

在数字经济的背景下,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成为推动社会再生产变化的核心力量。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信息技术的应用,数字经济不仅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模式,还推动了资本有机构成的深刻变革,从而影响了全球经济结构的重构。通过对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和典型历史经验的深入分析,结合数字经济的特点,可以得出以下几个关键结论。

1. 新质生产力推动社会再生产的变化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是技术和知识资本的积累。在传统经济中,社会再生产主要依赖于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而在数字经济中,技术资本、知识资本以及数据的应用成为推动社会再生产的关键因素。知识技术含量高的生产资料(如高端装备制造、信息技术设备等)是扩大再生产的基础,这一部分的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直接决定了社会生产规模和速率的扩展。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提升装备制造业的技术水平与质量,尤其是知识和技术资本的提升,成为推动社会再生产转型的首要突破口。数字技术和创新驱动的产业升级,不仅加快了经济的转型,也为社会再生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2. 资本有机构成影响经济结构的演变

资本有机构成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在传统的资本主义生产中,资本有机构成通常依赖于生产资料(不变资本)和劳动力(可变资本)的比例关系。然而,在数字经济时代,不变资本(技术资本和知识资本)的比例显著增加,而可变资本的比例逐渐下降,这意味着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之间的比例发生了变化。任何改进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周转率的因素,都会引致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并进一步导致剩余价值或利润的差异。这种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不仅影响国内经济的结构,还通过全球资本流动和技术扩散影响国际经济的相互关系。尤其是全球化背景下,单一要素的偏向性积累容易导致国际经济关系的不平衡,使得某些国家在全球市场中处于不利位置。

3. 后发国家经济赶超与全球经济平衡的实现路径

对于处于经济发展初期的国家(即后发国家)而言,通过资本积累、技术引进和产业转型实现经济赶超是一个历史性、阶段性的战略选择。这种经济赶超通常表现为单一要素的偏向性积累,如利用外资优先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然而,从全球经济协调发展的长期趋势来看,因为全球经济逐步趋向资本和劳动的均衡流

动,以及技术、信息的高效配置,发展中国家适时转向制度型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战略选择。

在全球化遭遇逆境变局的背景下,区域一体化和国际合作对全球经济关系的协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市场的开放,不同国家和地区能够实现资源和生产要素优化配置,促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构。在此过程中,数字科技推动的新产业革命与新质生产力成长向全球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是在高标准经贸规则和全球经济合作的层面,需要更加密集的规则创新和协调。

4. 数字经济快速发展要求全球经济治理架构作出相应的调整

这包括更加自由的贸易规则、跨国投资的便利化以及技术创新的全球共享。这些变革有助于提升全球产能流动的效率,促进市场高位出清,最终推动全球经济的协调与平衡发展。

当前全球经济增长的悖论之一是,尽管数字科技驱动的新产业革命和新质生产力正在不断提升生产效率,但全球经济增长的速度却未能同步加快。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型开放与制度性竞争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各国在国内制度改革与国际间的开放协调上存在立场、利益差异,导致了全球资本、技术、信息流动不畅和资源配置的低效。因此,要解决这一问题,各国必须进行国内制度的创新,通过更加开放的市场和更加灵活的产业政策,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变化,推动资本有机构成的提升,以应对当前全球经济增长缓慢的局面。

(二)政策启示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加大对知识资本和技术创新的支持。随着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技术创新和知识资本积累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提升竞争力的关键。因此,政府应加强对研发的支持,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特别是在装备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中提升技术含量。同时,加强高等教育和职业培训体系的建设,提升人力资本的质量和数量,为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提供持续的人才保障。

第二,积极推动制度型开放与国际合作。制度型开放是推动“双循环”战略的重要举措。中国应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优化营商环境,吸引外资进入技术密集型和创新驱动型产业。与此同时,加强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合作,推动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议谈判,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升在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中的地位。通过制度型开放,可以有效推动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技术的全球扩散。

第三,促进资本有机构成的优化与产业升级。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应继续推进产业升级,特别是推动低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的转型。通过资本有机构成的提升,实现技术改造、生产方式创新,使得生产效率和产品附加值显著提高。鼓励传统产业加大智能化、数字化改造,推动新兴产业的培育,如人工智能、5G、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的应用,加快新质生产力的成长。

第四,加强全球产业链合作与区域一体化建设。中国应积极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如通过RCEP等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加强与东亚、东南亚等地区的经济合

作。同时,深化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合作,推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优化与重构。通过全球化合作,中国可以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增强全球资源配置的效率,促进全球经济的协同增长。

第五,通过国际协作解决全球经济增长缓慢的结构性矛盾。各国应加强国内的制度改革,优化国内市场环境和产业政策,同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国际间的制度型开放协调是适应知识资本和技术创新变化的必要条件。各国应加强合作,通过创新的政策设计和更加灵活的市场规则,实现全球经济的协调发展。

总而言之,本文通过对数字经济背景下新质生产力和资本有机构成变化的理论分析,揭示了在全球经济数字化发展趋势下社会再生产模式发生的深刻变革。数字经济的崛起不仅改变了资本有机构成,还推动了全球产业链的重构和国际经济治理结构的演变。中国在“双循环”战略的实施的,通过提升知识资本、推动技术创新和加强国际合作,能够有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制定者应抓住这一历史机遇,通过深化改革、优化产业结构和推动全球合作,促进经济结构的转型与升级,为中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

[参考文献]

- [1] 林毅夫. 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 [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 [2] 张军. 顶级对话——理解变化中的经济世界 [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 [3] 姚梦真, 姚远.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资本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N]. 金融时报, 2020-12-14.
- [4] 王俊, 苏立君. 元宇宙与资本结合的剩余价值生产方式 [J]. 财经科学, 2022 (7): 62-75.
- [5] 徐志向, 丁任重, 张敏. 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视阈下中国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研究 [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1, 12 (5): 40-63.
- [6] 冯金华, 孟捷. 投资品部类的自主积累和增长在何种条件下是可能的——基于马克思再生产图式的考察 [J]. 中国经济问题, 2019 (4): 3-18.
- [7] 赵峰, 赵翌辰, 李帮喜. 马克思两大部类模型与中国经济的宏观结构: 一个经验研究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7, 31 (2): 73-81.
- [8] 王跃生. 应对国际经贸复杂环境充分发挥外贸和外资对经济复苏的关键作用 [J]. 经济研究参考, 2023 (4): 16-18.
- [9] 刘元春. 加快推动经济进入市场型全面复苏阶段 [N]. 经济参考报, 2020-07-13.
- [10] 黄建忠, 王思语, 王茜. 统筹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思路与对策 [J]. 国际贸易问题, 2024 (4): 1-11.
- [11] 杨连星, 铁瑛. 区域贸易协定, 投资条款差异性深化与跨国并购意愿 [J]. 管理世界, 2023, 39 (9): 36-59.
- [12] 黄建忠, 赵玲, 何茜茜. 加快中国特色数字经济发展的若干理论思考与政策建议——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J]. 宏观经济研究, 2023 (4): 4-13+82.
- [13] 铁瑛, 朱佳纯, 黄建忠. 出口贸易“稳中求进”的结构动能与增长源泉 [J]. 世界经济, 2022, 45 (11): 27-52.
- [14] 许唯聪, 杨婷. 新发展格局下 RCEP 驱动经济双循环的理论机制与实现路径 [J]. 国际贸易, 2023 (8): 12-22.
- [15] 刘鑫, 顾雪芹. 外资提升双循环战略链接功能的新机制和新路径: 以上海为例 [J]. 社会科学, 2022 (12): 131-140.

- [16] 戴翔, 华笑烽. “双循环”促进利用外资“稳中提质”的效应评估 [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44 (2): 64-76.
- [17] 顾晓燕, 朱玮玮, 薛平平. 知识产权贸易对“双循环”有效联动的影响及动力机制研究 [J]. 经济问题, 2023 (6): 1-8.
- [18] 杜运苏, 张为付. “双循环”战略下对外贸易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 [J]. 江苏理工学院学报, 2021, 27 (5): 47-51.
- [19] 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第 1—3 卷 [M]. 上海三联书店, 2009.

Digital Social Reproduction, Changes in the Organic Composition of Knowledge Capital, and “Dual Circulation”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HUANG Jianzhong HUANG Lihu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this paper innovatively investigates the intrin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reproduction, the organic composition of capital, and the “dual circulation”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Moving beyond the traditional organic composition of capital theory’s singular focus on value quantity, the analysis examines the novel forms and functions of new constant capital—such as knowledge-intensive and innovation-driven capital—in the digital economy. It thereby explains the changes in digital social reproduction and the organic composition of knowledge capital, as well as their impact o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ual circulation”. This study also provides an extended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theory concerning the digitally-driven internationalized social reproduction cycle. Furthermore, by summarizing and reviewing four types of typical cases in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ir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the paper propose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enhancing China’s innovation-driven organic composition of capital,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social re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ng a high-quality “dual circulation”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Keywords: Digital Economy; Social Reproduction; Organic Composition of Capital; “Dual Circulation”

(责任编辑 张晨烨)